

# 具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文化特质

## ——吕梁出土的商代方国青铜器之一

□ 胡春良

吕梁作为商代方国主要的集中地区,青铜器的制作生产具有明显的方国特色。石楼等地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见证了山西商代方国青铜器制造技术的高度发达,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铸造工艺等等都是宝贵的文明遗产。本文介绍了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其特点,重点介绍了石楼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对于研究商代方国的历史、青铜器的铸造有一定的价值。

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方国特色。“方国”一词最初由孙怡先在《契文举例》中提出。《周易·既济》篇载,“方,国也”。“方”便是“所有的国”,甲骨文中称为“多方”。在甲骨卜辞中,有称为“X方”的国,又有不称“X方”的国。商王国时期的国家就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历史上山西北部是鬼方的活动区域,鬼方的青铜艺术风格和殷商的青铜器十分相近,明显受到商王朝的影响。据史籍记载,商武丁时期在山西北部有许多民族的方国,如土方、工方、羌方等。商在山西北部最大的方国是沚。这些方国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山西北部,包括现在的石楼、保德、河曲、永和、柳林、离石等地。这些方国的青铜器艺术既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些方国长期镇戍和与北方民族征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在装饰与器形上又具有了草原文化元素和印记。

### 一、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概述

吕梁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地主要集中在石楼县和保德县等地。石楼县地处黄河中游,是一块古老的文明丰盈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夏为鬼方,商为沚国,春秋称屈邑,西汉名土军,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石楼至今。郭沫若用甲骨文考证,认为石楼可能就是商代的鬼方。刘敦愿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山西石楼出土龙纹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一文,研究了名家的众多说法,并提出“以龙蛇纹样为主装饰青铜器,应是夏族余民”的观点,亦即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体一点说,很可能

是鬼方的遗存。石楼县现有文物229件,59处文物保护单位,有11处古建筑、4处古墓葬、33处古建筑和56件国家一、二级青铜器文物。

石楼县出土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珍贵,确实罕有。这里发现大量陆龟、大象、犀牛、三趾马的化石,为研究黄土高原的地质地貌和物种进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在当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遗址,并伴有300余件珍贵的殷商青铜器。这些文物的大量出土,对研究商周时代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大量商周时代青

铜器的频频出土,石楼县被称为“全国三个殷商出土方国之一”。

自1956年至1993年,在石楼县城二郎坡、义牒、桃花庄等17个遗址,分9批、8次,出土殷商青铜器3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兵器、乐器、食器、酒器、生活用具6个类型,以酒器居多,兵器次之。这些殷商青铜器,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59年8月,姜太公妻桃花女的原籍桃花庄姜太公岳父的坟墓中一次就出土商代青铜器79件。在这些已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价值最珍贵的当属“龙形觥”(也称龙纹觥),被称为姜太公酒器。据专家考证,姜子牙就是石楼县义牒镇人,其岳父去世时,姜子牙送龙形觥予岳父陪葬。这件造型独特、纹饰奇绝的青铜器叫做“龙形觥”。

### 二、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特点



蛇首扁柄斗(山西博物院藏)

吕梁出土的青铜器生活用品有环首刀、羊首刀、鹿首刀等。此外还有很多以动物造型为设计图案的兽首刀,以及蛙首、蛇头做装饰的匕、勺等,这些青铜均为素面体,只有少量的装饰有斜方块或者斜条纹。后兰家沟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蛇首扁柄斗,属于挹注器(把液体盛出来再注入的器具),长37cm,勺径4.8cm,1957年出土。斗作敛口,鼓腹平底,为罐形。底部一侧伸出扁平的长柄,柄首为镂雕的二蛇戏蛙,极其生动。柄身的装饰为云雷纹的夔龙,斗腹装饰着云雷文的饕餮纹。

吕梁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是中国青铜的独特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

重要物证遗存。这些青铜器出土时,多数为青铜小件工具与青铜武器的组合,大件则不与小件工具组合。这也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礼仪制度和规制与商代中原文化的礼仪不同。具有很高的民俗、礼仪、历史人文研究价值。

吕梁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兵器数量最多。礼器有铜鼎、爵、尊、觚、豆等。这些青铜器造型奇特,装饰纹样华丽繁缛,结构构思奇巧,工艺技术娴熟,具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文化特质。

吕梁出土的兵器多为兽首形、铃首的短剑饰管、釜斧饰管、釜戈饰管釜矛和军事装备的胄、靴形器,铜盔、青铜弓形器,具有草原风格。其中桃花庄出土的一件青铜虎饰匕,镶嵌绿松石,匕首弯曲修长,匕身手柄部位装饰一只写实的大猛虎,大头卷尾,身微后倾,一副准备腾跃扑状,动态十足。虎眼镶嵌着绿松石,整个匕身为素面体。残长18cm,宽4.6cm,1959年出土。制造工艺精细高超。



青铜虎饰匕(山西博物院藏)



## 古镇问酒道

□ 李世义



笔者常去杏花村与朋友们约会,除聊家常外也聊酒以及经销白酒的一些过程,其中就包括酒文化的提炼以及宣传用语,每个酒企都在宣传自己的产品,广告语五花八门,以酒会友,酒美人和,骨子里……,什么匠心,什么美酒等等,仔细推敲缺少深度,都不能代表中国几千年酒文化核心内容。好多酒企也没有深入挖掘白酒文化,究竟什么能代表白酒文化?其实是多方面的。

某日,偶见一酿酒师工作室有一幅隶书书法作品,内容是《盗不劫幸秀才酒》。从字面看好像与工作室的氛围不和谐,认真看全文,查阅资料才知道《盗不劫幸秀才酒》是《东坡志林》中的一篇小小说,作者为大文豪苏东坡,全文百二十余字,原文如下:

幸思顺,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无贤愚皆喜之。时劫江贼方炽,有一官人舣舟酒下,偶与思顺往来相善,思顺

以酒十壶饷之。已而被劫于蕲、黄间,群盗饮此酒,惊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识其意,即给曰:“仆与幸秀才亲旧。”贼相顾叹曰:“吾侪何为劫幸老所亲哉?”敛所劫还之,且戒曰:“见幸慎勿言。”思顺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盖尝啖物,而不饮水云。

这篇文章是典型的谈小说,体裁大多来源于生活,具有“街谈巷议”、“琐言俚语”的特点。小说情节简单、表述自然、寓意深远。主要讲秀才幸思顺以酿酒卖酒为业,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生活阅历丰富,而且大家都喜欢喝他酿的酒。某天,有个做官的得到他馈赠的十壶酒后,路遇盗贼。盗贼喝了酒就知道是幸秀才所酿,又听官人说,他是幸秀才的“亲旧”,盗贼不仅退还所盗物品,还恳请不要对幸秀才言及此事。在结束全篇时,特地点出72岁高寿的幸秀才夏日耐渴之情状,从侧面进一步烘托出主人公独特的豪气。

笔者认为该文章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位,同时也分别代表三个层次的人群。仕族阶层的官人,路遇见财生盗窃之心的毛贼,虽身为达官贵人,但没有被盗贼放在眼里,盗贼因酒识人,将所盗财物归还官人,运气极好;中层阶级的幸思顺,幸秀才一介老儒以沽酒为业,人生是不得意的,但是他的酒让人尝一口,便知非他人之酒,可见他制酒技艺超群不凡,酒的质量上乘而有特色,名气极大;作为盗贼,虽然抢劫物品但没有伤人,知道官人是幸秀才的“亲旧”后把物品归还,

止恶扬善讲义气。

《盗不劫幸秀才酒》一文的作者是苏东坡,苏氏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然而他豁达开朗,几起几落没有怨恨心理,即使流放期间也是充满正能量。文中的幸思顺其实是苏东坡个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幸思顺酿酒卖酒的生活,也是苏东坡被贬时的真实写照。写此文章时东坡先生被贬到海南岛,面对气候的不适、生活的无助、物资的匮乏,没有失去那份诙谐轻松,他对弟弟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可见东坡先生,纵使身处逆境,伤痕累累,也依然以善面对,向阳而生。

酒有大道,酿无止境。酿酒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与大自然对话的感官艺术。老子用“道法自然”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根本属性。认为“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这种哲学思想与酿酒之道不谋而合。杏花村白酒的酿造也讲究“天人合一”“顺天时应地利”,每个季节所酿白酒,理化指标也有差异,当地的水质、土壤、气候、空气等对酿造至关重要,而这一切,无不得益于天地造化,自然恩赐。

酿酒业的传统工艺,无不是人类在与自然相处与磨合中总结出的智慧结晶,而“人为”在酿酒业中的作用即为掌握自然规律,顺天应时进行生产并将技艺进行传承与优化。“人”的作用力,实际上也是在“顺从天

道”“返璞归真”的基础上实现。

喝酒有三重境界,酒杯要斟满,满酒才敬人,酒杯一碰,浅浅醉意便是微醉。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第一重境界。至亲朋好友久未见面,突然相见,谈论往事,互诉衷情,杯杯见底,酣畅淋漓第二重境界。时下很多人开始用酒来排解内心的忧愁与压力,把酒当作情感的寄托,彼此之间毫无芥蒂、无需掩饰的坦诚相待,身心打开,不再压抑,酣酣大醉便是第三重境界。

对于饮酒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诗中不仅道出了饮酒后的真情流露,也谈到饮酒给人们带来的乐趣。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人饮酒后会返朴归真,根源其实是回归本性、心地仁爱、品质醇厚。一个人从醉酒中让自身暂时回复到些许的自然状态,从而饮酒微醉、身心合一,放下内心的纠结,找到天人合一的感觉。

做人当学苏东坡,幸思顺,做酒也需要向他们学习。东坡先生著有《酒经》一文,说明他自己喜饮酒,也擅长酿酒。文章既论述了酒的历史背景和制作工艺,又赞赏了酒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纯净品质,还引出了酒的饮用文化和饮酒之道,无愧于“经文”的称号。

真正的酒,如同神秘的土地,它是由辛勤劳作、创造和艺术融为一体的灵魂。“酒,天下百物之长也”,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酿酒师,遵循天道、根植传统,精心酿造“色之清,香之芳,味之醇”的玉液琼浆。